

中央红军长征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遵义会议

曾羽 李斌 杨正权 编著
郑茂刚 杨文富 刘 强



中国档案出版社

中央红军长征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黎平会议

曾羽 李斌 杨正权 编著
郑茂刚 杨文富 刘强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增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央红军长征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
曾羽等编著. -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12

ISBN 978 - 7 - 5105 - 0040 - 4

I. 中… II. 曾… III. 中国共产党 - 党史 - 史料 -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IV. D235.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2733 号

黎平会议

LIPINGHUIYI

出版/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宣武永安路 106 号 100050)

发行/中国档案出版社

印刷厂/贵阳云岩精彩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787 × 1092mm 1/16 印张/13.125 字数/298 千字

版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定价/28.5 元

本课题为凯里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学科研究项目

本课题由中共黎平县委、黎平县人民政府资助研究

黎平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红军冲破了国民党的重围,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及时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红军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就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为以后的胜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因此,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①

胡锦涛

1986年10月24日

^①胡锦涛.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黎平会议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页.

弘扬“黎平会议”精神 推进黔东南生态文明崛起

——《中央红军长征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序

在纪念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召开七十五周年之际,凯里学院组成“黎平会议研究”课题组,编写了《中央红军长征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一书,是我州在党史军史研究上的又一重大成果。此时此刻提笔作序,回顾那段激情似火的革命岁月,不禁心潮澎湃,敬仰之情难抑。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是一座彪炳千秋的历史丰碑。红军进入贵州后途经黔东南的黎平、锦屏、榕江、天柱、剑河、三穗、台江、施秉、黄平、镇远、岑巩,在敌人重兵围堵之中,红军将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战,在黔东南的革命史上书写了惊心动魄的篇章。

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从此红军长征有了正确的方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黎平会议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是中共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党和红军实现重大战略转变的开始,开创了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先河,对于中国革命建设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1986年12月,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指出:“黎平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黎平会议的丰功伟绩早已载入史册,其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昂扬向上、民主团结的革命精神和一往无前、去争取胜利、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的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已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巨大动力。

《中央红军长征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的编著者们本着存史、资政、育人的崇高目的,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针对目前对黎平会议认识和研究的局限,针对黎平会议宣传、解读中存在的遗漏和不足,着眼还原历史的真实,着眼继承和弘扬黎平会议伟大精神,深入黎平等县实地考察、走访知情人士,开展座谈交流,认真研读了大量文献资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作出了积极奉献。该书首次对黎平会议进行了系统研究和阐述,史料详实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不仅仅是一部学术研究著作,也是一部帮助人们了解黎平会议

的历史教科书,对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加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扩大黎平会议宣传,加快黔东南红色旅游发展,实现全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前,黔东南正处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抢抓机遇、加快发展,需要全州各族人民群众进一步弘扬黎平会议精神,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奋勇拼搏,坚定走生态文明崛起的跨越式发展之路,努力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美好黔东南。

中共黔东南州委书记



2009年12月9日

序	廖少华
第一章 战略转移：从湘江战役到通道会议	(1)
第一节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	(1)
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
二、战略大转移的决策部署	(4)
第二节 湘江战役	(5)
一、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	(5)
二、蒋介石精心布置第四道封锁线	(7)
三、强渡潇水	(9)
四、血染湘江	(10)
第三节 通道会议	(16)
一、湘西布防	(16)
二、通道会议	(18)
三、通道转向	(21)
第二章 生死抉择：黎平会议	(22)
第一节 攻占黎平	(22)
一、黎平布防	(22)
二、炮轰羊角岩	(25)
三、激战五里桥	(27)
四、攻占黎平城	(28)
第二节 黎平会议	(31)
一、会议召开	(31)
二、黎平整编	(37)
三、黎平群众大会与黔东南扩红	(38)
四、十六字令	(39)
第三节 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的民族政策	(40)
一、制定民族政策	(40)
二、民族政策在黔东南的宣传和执行	(41)
第三章 曙光初现：黎平转兵	(44)
第一节 调兵遣将	(44)
第二节 左路纵队转战黔东南	(47)
一、巧夺高洋坳	(47)
二、计取谷陇	(48)
三、攻克黄平	(49)
第三节 右路纵队转战黔东南	(50)
一、攻占铜鼓	(50)
二、河口会战	(52)
三、挺进剑河	(53)
四、鼓楼坪战斗	(54)
五、激战镇远	(55)
第四章 进军黔北：从猴场会议到突破乌江	(57)

第一节 猴场会议	(57)
第二节 突破乌江	(60)
一、乌江布防	(60)
二、首渡回龙场	(62)
三、激战江界河	(63)
四、不战而渡茶山关	(65)
五、攻占遵义城	(66)
第五章 丰碑永存:黎平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68)
第一节 黎平会议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	(68)
一、黎平会议是决定红军命运和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	(68)
二、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战略方针转变的重要开始	(69)
三、黎平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起点	(69)
四、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重要基石	(70)
第二节 黎平会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71)
一、黎平会议红色资源的价值分析	(71)
二、黎平会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73)
三、黎平会议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73)
第三节 黎平会议精神	(75)
一、实事求是精神	(75)
二、独立自主精神	(77)
三、昂扬向上精神	(78)
四、民主团结精神	(79)
第六章 弘扬精神:大力推进黔东南实现科学发展	(81)
第一节 黔东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思考	(81)
一、黔东南“欠发达、欠开发”较低层次的州情现实	(81)
二、黔东南资源优势及其发展思路	(82)
第二节 走生态文明崛起的科学发展道路	(84)
一、走生态文明崛起的科学发展道路是黔东南的现实选择	(84)
二、走生态文明崛起的科学发展道路是黔东南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85)
三、走生态文明崛起的科学发展道路是黔东南利用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的理性选择	(86)
四、走生态文明崛起的科学发展道路是黔东南抓住战略机遇期、推进历史性跨越的现实需要	(87)
第三节 黎平会议精神与推进黔东南生态文明崛起	(88)
一、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88)
二、坚持独立自主精神,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89)
三、坚持昂扬向上精神,着力构建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和谐民生	(89)
四、坚持民主团结精神,着力建立完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体制	(90)
附 录	(92)
一、红军文献	(92)
二、红军回忆录、红军日记	(97)
三、中央红军长征过黔东南大事记	(130)
四、中央红军在黔东南的故事	(132)
五、中央红军经过黔东南写的标语	(168)
六、中央红军过黔东南电文	(173)
七、中央红军在黔东南的战斗遗迹	(189)
参考文献	(196)
后记	(201)

第一章 战略转移:从湘江战役到通道会议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实施战略大转移。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时,发生了红军所有战役中最为惨烈的湘江战役,损失惨重。血的教训使红军将士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为通道转向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通道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行军线路转向^①国民党军薄弱的贵州,以避开强敌、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为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作出改变战略方针的决定作了重要准备。^②

第一节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

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进一步巩固扩大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立即准备第五次“围剿”,并于1933年9月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中央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在政治上,他继续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加强地主武装建设,强化反动统治;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是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外国军事顾问;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围剿”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③这次“围剿”,蒋介石先后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蒋鼎文为前线总指挥,下辖3路军,共33个师又3个旅,是“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其任务是:向广昌方向筑垒推进,寻求与中央红军主力决战。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粤军11个师又1个旅,阻止中央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

^①不宜提“通道转兵”。中共黎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黎平会议(内部资料),1985:152-153页.

^②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58.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2006:3.

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

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湘军9个师又3个旅，“围剿”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并相机东进，阻止中央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

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中央红军向东发展。浙赣闽边守军5个师又4个保安团，“围剿”闽浙赣苏区红军，并配合北路军第二路军，阻止中央红军向赣东北方向发展。

空军5个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支援作战。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约10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但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也存在不少困难。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控制了各级党、政、军大权。^①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秦邦宪）等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因而，在国民党军“围剿”前夕，未及时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准备，而是命令由红三军团、红十九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和由红一军团、红十四师为主组成的中央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 and 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持续作战而未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即于9月下旬仓促开赴中央苏区北线迎击国民党“围剿”军。

9月25日，完成“围剿”准备的国民党北路军，以3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进攻。红军东方军奉命由福建省将乐、顺昌北上，拟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国民党军，进而与敌在抚河会战。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10月15—17日，奉命由荐源桥至棠阴的国民党军堡垒线间隙北出作战的中央红军主力，在云盖山、大雄关遭“围剿”军5个师的攻击，伤亡惨重，被迫向苏区内转移。至此，红军虽经近两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红军在北线进攻受挫后，中共临时中央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制止国民党军的“围剿”。此间，驻福建省的国民党第19路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反蒋介石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抽调11个师前往镇压。毛泽东向中共临时中央提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2006：3。

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①。而中共临时中央却不懂得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不肯与十九路军在军事上进行配合,拒绝采纳毛泽东等的正确建议,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打击和分化下于1934年1月很快失败,蒋介石又腾出手来全力进攻中央苏区,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即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主力从东、北两个主要方向采取堡垒攻势,向广昌方向进攻,其第3路军主力向建宁推进,第6路军2个纵队从永丰向沙溪、龙冈推进。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中共临时中央仍然要求中央红军(1934年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处处设防,广筑碉堡,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1月下旬开始,红军全线开展阵地防御战。3月上中旬,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北路军频繁交战,红军节节失利,损失惨重,逐步向广昌撤退。至此,国民党北路军完成了乐安至黎川的堡垒封锁线,开始准备进攻广昌。国民党军东路军亦筑碉步步进逼,向建宁推进,并与北路军第3路军在闽赣边界的德胜关会师。各路“围剿”军的合围紧逼,迫使中央红军主力在广昌、建宁等地与之决战。

4月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拼力抵抗,并组织反击,但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28日广昌失守。4月下旬至5月中旬,国民党军东路军加紧进逼建宁,相继占领太阳嶂、将军殿、弋口、挽舟岭、江家店。16日,国民党东路军在北路军和空军配合下攻占建宁。南路军于5月上旬占领筠门岭要塞。6、7月间,红军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均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苏区范围逐渐缩小。蒋介石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重新调整部署,于7月上旬开始全面进攻。此时,中革军委以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省瑞金出发,经福建省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但此举亦未能牵动国民党“围剿”军回援和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压力。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都很匮乏,红军已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了6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将红军主力分别配置在兴国、古龙冈、头陂、驿前、连城、筠门岭等地区,继续同国民党军拼消耗。

8月5日,国民党北路军9个师在空军、炮兵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攻击。至月底,红军击退国民党军多次冲击,使敌第89师丧失了战斗力,但自身也伤亡严重,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八军团。10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歼红军的目的。这时,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放弃中央苏区。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主力红军撤到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236.

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结。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7日，率领主力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实施战略转移。

二、战略大转移的决策部署

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形势日趋恶化，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人“围剿”已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便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只是一直举棋不定。^①主要是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请示需要时间，且共产国际虽然答复同意，但希望能坚持一段时间。所以，直到9月初对打破敌人“围剿”完全绝望后，10月上旬中央又得知蒋介石要发动最后围歼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②才仓促决定迅速突围。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主要有：第一，在战略指导思想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不遗寸土的方针，决定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中央红军在阻止敌人推进时，应以“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财”为基本原则，要求部队进行运动防御，强调在防御的同时，“应准备全部撤退”。^③9月15日，中革军委又发出训令，要求中央红军“无论如何应该以保持自己有生力量和物质基础为我占据第一等基本原则”。第二，建立健全了各级指挥机关。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立即将在敌人占领区中各县区的军事部，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为游击队司令员、队长，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从组织上对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后苏区的斗争作了初步安排。9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各县苏维埃的指示信》，对边区、战区在“万一”失陷后的苏区工作做了布置。第三，从人力物力上做了准备。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发表了《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要求中央苏区“无论如何要做到在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去上前线”。同时，决定成立红八军团和教导师等，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中央苏区各级党和政府迅速展开兵员动员和粮食、草鞋、食盐、棉被、军用器材等的筹集工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补充兵员和物资。第四，明确了转移的方向。据李维汉回忆，1934年7、8月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④，从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下达训令至8月7日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六军团在受命寻找红二军团并与之会师的同时，实际上还担任了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的先遣队”^⑤，到10月5日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达成停火协议，为中央红军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五，发出了战略转移的信号。9月29日，张闻天为

①参见刘秉荣：《中央红军长征纪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12。

②徐焰，马祥林：《重解长征之谜》，人民出版社，2007：5-6。

③《中革军委关于红三军团应阻石城以北敌人以保卫瑞金部署的指示》（1934年9月8日）。

④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343。

⑤李达：《寻找贺龙同志——忆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前后》，《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73-74页。

《红色中华》报写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①，这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应该说，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是准备较早，但决策迟疑不决，也是很充分的；转移高度保密，只是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甚至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正如后来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②。长征出发前没有“给以必要的修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③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逐步失败，中共中央被迫考虑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退出中央苏区。为此，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对红军主力突围转移进行具体策划。最高“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对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一重大行动，“三人团”不仅没有提交政治局讨论，甚至连“三人团”的行动都严格保密，不仅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不能过问，连中央政治局常委、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和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也无权过问。准备工作在“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掩护下秘密进行。对此，博古在1943年11月13日于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④。当时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时的方针是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然后沿着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然而，红军突围转移中，“三人团”对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到何处去“始终秘而不宣”，采用“甬道掩护”、“大搬家”式的夺路突围方式，抬着笨重的机器和坛坛罐罐缓慢行军，使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

第二节 湘江战役

一、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各部队按照中革军委颁布的《野战军渡河计划》，分别从零都等10个渡口渡过零都河，准备从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突围出去。10月19、20日中央红军主力先后到达国民党南路军阵地前的仁风街、双茆（园）、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完成了突围准备。国民党南路军陈济棠部在赣州以东、沿桃江（即信丰河）向南，经大埠、王母渡，折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构成了第一道封锁线，即所谓“钢铁封锁线”，阻止中央红军进入广东。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决定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地段突破粤军封锁，

①《红色中华》第239期，1934年9月29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18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18页。

④刘秉荣，中央红军长征纪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2。

向湘南前进。突围前,红军曾将要经过的地点通知了陈济棠,声明只借道而行,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陈济棠是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之间存在矛盾,他害怕红军入粤,也害怕蒋介石趁机入粤,所以,早在第五“围剿”中与红军作战就比较消极,开始与红军作试探性接触,并在10月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当红军长征时,陈济棠基本上执行了上述协议,让开大路20公里,在其防区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为红军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10月21日红军各军团开始突围后,由于陈济棠接到红军通知后未来得及使其前沿部队了解其意图,双方战斗仍相当激烈,直到粤军得到陈济棠的示意后才稍事抵抗、全线撤退,向安远、信丰、南康集中,让出了中间大道,红军主力随即向信丰东南地域前进。24日晚,红军各路先头部队开始西渡桃江,抢占河西要点,掩护主力过河。25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和红军其他部队从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了由粤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继续向西前进。^①

中央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军还没有弄清红军的战略意图。蒋介石即令南路军和西路军火速调兵,在湘粤赣边的汝城、仁化、乐昌间设置第二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10月2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敌军尚未清楚红军意图之际,沿赣粤、湘粤边界,迅速向湖南的汝城和广东的城口方向前进。但由于红军采取“大搬家式”的转移,行动十分迟缓,主力红军成为中央机关的掩护队,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和战斗力。尤其是博古、李德等只顾夺路西进,采取避战方针,使红军丧失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性胜仗的有利时机。^②11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监视汝城之敌,主力分三路纵队,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由汝城至大坪间通过,向百丈岭、文明司前进;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纵队,由新桥经界头、九峰山向九峰圩前进;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九军团等部队为左纵队,由城口、思村向岭子头前进。从5日至8日,中央红军各路纵队继续西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至此,中革军委鉴于红军主力转移已无秘可保,才正式向下通知说,中央红军这次进行转移是为了到湘西去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③

针对中央红军继续西进的情况,蒋介石迅速在粤汉铁路湘粤边湖南境内的郴县、良田、宜章、乐昌间设置第三道封锁线。该线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九峰圩仅有粤军1个团,并无堡垒;乐昌也只有粤军2个团;汝城、宜章间无正规部队,只有民团;宜章以北仅只有湘军的1个团,但该地区公路发达,交通方便,利于兵力机动。11月7日11时,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以急电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提出突破宜章、乐昌、郴县间敌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方针的报告,认为:红军进入湘南,湘军处于存亡关头,必将与蒋介石协同动作对我;粤军疑蒋入粤,目前对我无与蒋介石南北夹击企图。因此,“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乐、郴间封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第2版,第48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第2版,第49页。

③李聚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113-114页。

锁。”^①同日16时,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等,决定中央红军于宜章以北的良田及宜章东南的坪石间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以红三军团为右路军,从宜章以北通过;军委2个纵队和红五、红八军团随后跟进;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从宜章以南通过,红九军团随后跟进。遵照中革军委的决定,11月9日,红三军团红五师攻占宜桥市,10日逼近郴县,切断郴宜大道;11日,红六师攻取宜章,红三军团负责掩护中央红军右侧安全,等待红一军团主力;15日,红一军团越过大王山,占领了宜章县的小镇白石渡。由于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分别占领了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支撑点宜章城和白石渡,使红军顺利地通过了粤汉铁路线。至15日,中央红军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全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红军进入湘南后,成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重新建立赤卫队,鼓舞了湘南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战略转移,突破国民党军的前三道封锁线,尽管相对比较顺利,没有打大仗、硬仗,但因长途急行军、气候渐冷、水土不适等,使红军减员不少。据桂林市党史研究室提供的数据,第一次突围减员3700余人、第二次突围减员9700余人,第三次突围减员8600余人,共减员2.2万余人。这就是说,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前的实际兵力,不再是出发时的8万多,而只有6.4万人左右。^②

二、蒋介石精心布置第四道封锁线

还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前,蒋介石已判明红军南进突围的战略意图,并非真要占据湘粤桂边境,而是沿红六军团路线经桂东北去湘西北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他很害怕这两支红军会合后在湖南重建根据地,将湘鄂川黔的苏区连为一体,形成更大的红色区域,几年的“剿共”心血将付之东流。在红军还未完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就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嫡系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湘、粤、桂军和中央军,共26个整师、30余万兵力,全力“围歼”红军。蒋介石的“围歼”计划,是凭借两道天然屏障,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区,在宁远的天堂圩与道县间进行合击。此一步骤若难实现,第二步,则是聚集各路大军,阻截红军于桂东北湘江以东地区,在湘江之滨聚歼之。^③

早在红六军团西进前后,湘桂两省军阀就已有守备湘江沿线的准备。8月间,桂系军阀预料红军将突围而走,白崇禧遂亲赴江西安远,准备将桂军第四十四师回撤,9月底10月初该师回到桂北,立即赴全州、兴安一线构筑工事,共构筑碉堡140座。同时,湘军何键得知红军有向西转移的意图后,也令湘西各县加修碉堡,其中自衡阳经祁阳、零陵至黄沙河一线,共修碉堡410座。10月25日,当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即判断中央红军入湘有与贺龙会合的可能,29日决定派薛岳部率8个师取道龙岗、桂东、资兴、郴州、桂阳、新田、永州

^①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编委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325。

^②参见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红军长征突破湘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19。徐焰,马祥林,《重解长征之谜》,人民出版社,2007:

^③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35。

线进行截击,迫使红军不能北上,致力西进;30日又命薛岳部于11月24日以前集结于永州附近,令桂军加强对黄沙河、全州、兴安、桂林之碉堡线的控制,命令南路军节节阻击,迟滞红军,以便决战。11月6日南昌行营电令:歼灭红军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①。

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主要目的是妄图消灭中央红军,也不忘排除异己。他的嫡系部队可充分利用红军进入了湖南,就要与湖南、广东等地方军阀缠打厮杀的机会,消耗地方军阀的实力,又为他的嫡系中央军部队追上红军减轻压力和赢得时间。更让他兴奋不已的是,红军如要继续西进,必定要连过潇水、湘江、漓水三条大河,他相信,这三道天堑,将最终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那里将是他最后“剿灭”中央红军的最佳战场。

11月12日,蒋介石做出了将红军“歼灭于湘水、漓水以东地区”的部署:令湘军何键部与嫡系薛岳部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令粤军陈济棠部以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区进行截击;令广西(桂军)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全县)、黄沙河一线沿湘江进行堵击与侧击;令贵州(黔军)王家烈部在湘黔边堵截,合计动用了25个师近30万人的部队,构成了一个以湘军和桂军两翼夹击与迎头堵击,中央军和粤军尾追截击、黔军策应封堵的口袋式包围圈,准备在湘江东西两岸一鼓“荡灭”红军。他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确定了一个五路追堵部署:以刘建绪为第一路军司令,统辖湘军3个师1个旅又7个团在黄沙河附近集结,协同桂军堵击红军西进;以薛岳为第二路军司令,统辖中央军4个师又1个支队在零陵附近集结,沿湘桂公路机动,堵截红军北进与西进;以周浑元为第三路军司令,统辖中央军4个师,首先攻占道县,尔后对红军进行截击;以李云杰为第四路军司令,统辖湘军两个师,经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尾追红军;以李韞珩为第五路军司令,统辖湘军1个师,经临武、水口(今江华)、永明(今江永)尾追红军。

对于这个“追剿”计划,蒋介石是动过一番脑筋的。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因此湘军入广西的全州,桂系军阀不会有什么顾虑,两军将会合着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李韞珩、李云杰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对红军跟踪追击,熟悉地形,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而以精锐的周浑元部攻占道县,等于断了红军的退路,逼迫红军不得不向湘江推进;薛岳部沿湘桂公路机动,随时可在决定性的方向与时刻投入战斗。这样五路大军协同,再加上粤军、桂军、黔军配合,红军不管何去何从,都是必败无疑。他从古代兵书《尉缭子》觅得数句:“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并将之写入作战命令,训令各路部队务必抓住天赐良机,奋力作战。为鼓励湘军卖命,他还手书一札,空投何键:“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何键接札,受宠若惊,当即复电:誓将拼死决战,决不负委员长重托。随后立即赶往衡阳,亲自主持军事会议,落实湘江决战的部署。于是,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各路国民党军依令行事,开始向湘桂边界地区疾速开进。

湘江地区,战云密布。西进的红军面临出征后最严酷的考验。

^①蒋介石.南昌行营鱼亥行战电令(1934年11月6日).胡羽高.共匪西窜记.贵阳羽高书店,1946:123.